

譯注經典的另類來生 ——《格理弗遊記》經典譯注版的再生緣

單德興*

筆者自 1976 年翻譯第一篇學術論述（楊牧先生的〈論一種英雄主義〉），¹ 轉眼已逾四十載，這段期間翻譯了近二十本不同性質的書，各有不同的領會，其中費時最久、篇幅最長、功夫最深的便是國科會的譯注經典《格理弗遊記》。我自 1998 年 6 月應邀執行此一經典譯注計畫，至 2004 年 10 月出版，前後耗時六載有餘，足跡廣達三洲，全書總計六百七十二頁，除了十五萬餘字的譯文之外，還有逾七萬字的〈緒論〉，逾九萬字的譯注、年表大事紀及參考書目等。齊邦媛老師在序言〈航越小人國〉中，稱其為「任何人都可以自慰曰『不虛此生』的貢獻」(5)。我一方面欣喜於有此機緣完成這畢生難得的譯注計畫，另一方面也遺憾由於求好心切，譯文與譯注一改再改，在校對階段依然有所增訂，以致晚了幾個月，未能在母親生前出版，只能將此書「獻給從小為我講故事、購買文學翻譯名著」的先慈。

班雅明在〈譯者的職責〉(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提出了幾個有關翻譯的比喻，其中最得我心的就是「來生」(“afterlife”)。² 翻譯界前輩學者劉紹銘教授對於翻譯也有「借來的生命」與「再生緣」之喻，前者指的是譯者藉由翻譯作品來抒發自己的感受與創作欲，後者指的是作品一譯再譯猶如再生。³ 這幾個比喻雖有不同，但共同的則是翻譯與「生」和「延續」的觀念。本文擬借題發揮，加以轉化，以實例說明經典譯注版《格理弗遊記》的幾個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¹ 單德興譯：〈論一種英雄主義〉(“Towards Defining a Chinese Heroism”)，王靖獻(C. H. Wang)原作，《中外文學》4卷11期(1976年4月)，頁28-45。

²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8), p.71.

³ 參閱筆者：〈寂寞翻譯事——劉紹銘訪談錄〉，《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臺北：允晨文化，2014)，頁273, 275, 294-95。

不同性質的來生或再生緣，以示翻譯工作之功不唐捐，以及文字因緣之不可思議，希望喚起學界對於學術翻譯的重視，即使無法親身參與其事，但至少在觀念與體制上予以應有的評價與肯定，以落實文化生根與發展，厚植我國與華文世界的軟實力。

國科會的「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開始於 1997 年，我是第一批應邀執行計畫的學者，雖然國科會事先已多次徵詢意見，擬出詳細的作業要點，但畢竟只是藍圖，如何一磚一瓦、一樑一柱蓋出經典譯注的大廈，眾人都在摸索中。我先前曾翻譯過十幾本書，逐漸累積出一些經驗，因此從事此一計畫時，希望能把握此「一期一會」，完成較接近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學術譯注，達成我所定義的「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也就是在譯譯文本時，力圖兼顧源始語言與文化 (source language and culture) 以及目標語言與文化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的脈絡。⁴ 然而《格》書譯注版後續所引發的一些現象則是我始料未及，帶給我不同的驚喜。

首先，就是當初撰寫〈緒論〉時雖然找到三個最早的中譯本，建立起《格》書在中國的早期接受史，但始終不知第一個中譯本《談瀛小錄》(同治 11 年〔1872 年〕5 月 21 日至 24 日上海《申報》連載)的譯者是誰。2007 年 6 月我重返哈佛大學，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巧遇我十二年前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時的社長韓南 (Patrick Hanan) 教授，他的考證功力深厚，屢為李歐梵、王德威院士等人所推崇。韓南教授三度邀我到他研究室，在交談中表示，根據他的考證《談瀛小錄》的譯者應是當時《申報》的編輯蔣其章，原作則可能來自《申報》創辦人英籍商人美查 (Ernest Major)。⁵ 沒想到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就在與韓南教授的交談中輕易得到解答。

再者，《格》書譯注版雖然詳盡且具特色，但附文本 (paratexts) 超過了譯文正文，並不符合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而該書在英文及其他語文的流傳史中，很重要的一個傳統就是被當成兒童文學來閱讀。為了避免那些附文本構成閱讀的障礙，我在贈送學童譯注版時，都會特別交代跳過正文前的部分，腳註有興趣則看，若會影響閱讀則略過。其實早在譯注版問世之前，我就考慮過出版普及版，並且擬出作業要點，提供給國科會與出版社參考，可惜未能立即實現 (我猜想主要原因是經典譯注系列成果無前例可循，而出版社不希望在譯注版問世前幾年出現「自己打自己」的現象)。

⁴ 有關「雙重脈絡化」的見解，參閱筆者：《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2009)，尤其頁 1-7。

⁵ 韓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徐俠譯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頁 106-07, 134-37。

然而，《格》書畢竟是世界文學經典，內容引人入勝，不同時代與年齡的讀者各有不同領會。為了達到經典普及的目標，終於在譯注版問世八年半之後出現了普及版，並在準備過程中修訂了百餘處譯文，以期精益求精。為了符合一般閱讀習慣，版面改為直排，除了齊老師和我的序言之外，其他附文本均置於譯文之後。普及版序雖將原先七萬餘字的〈緒論〉精簡為五千餘字，卻也加上了一些新資料，包括韓南教授考證出的第一位中譯者，以及林以衡博士提供的兩個日據時期的漢文譯本，為該書中文世界的早期流傳史提供了更多元的面貌。⁶

如果普及版是譯注本的一種來生或再生，那麼由譯注本所引發的學術論述和辯論則可謂另一種來生或再生。我在蔡祝青博士介紹下認識〈《格理弗遊記》在臺灣：日治時期〈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譯寫、諷喻與政治想像〉一文的作者林以衡博士。⁷他撰寫此文時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正從事日據時期臺灣漢文翻譯研究，查閱當時報章雜誌上的翻譯小說，發現《臺灣日日新報》曾連載〈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前者於昭和 5 年〔1930 年〕3 月 3 日至 5 月 18 日，後者於同年 7 月 6 日至 12 月 6 日，前後七個半月）。林文提到「時至今日，單德興以嚴謹的學術研究方式對《格理弗遊記》的翻譯，以及一連串由此引申而出對《格理弗遊記》中文譯本的研究、翻譯理論的闡述等，將是本文欲處理日治時期的〈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各項問題時重要的參考資料」（170-71）。文中多處引用《格》書譯注版的〈緒論〉、譯注與譯文作為討論的基礎，⁸尤其強調該書作為經典諷刺文學嘲諷時政之處。他主張從譯文看來，譯者的英文造詣已足以直接自英文漢譯，「並非一定要經由中文或是日文的二度翻譯」（196），而且藉由翻譯來諷刺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將小說的諷喻之意發揮的淋漓盡致」（197），由此可見當時臺灣知識分子的國際觀、英文能力與反殖策略。文末並表示，「未來如何能將日治時期翻譯文學的問題更為擴大思考，將更能加強臺灣文學與世界的對話與交流，實為臺灣文學研究值得重視的問題面向」（197）。看到自己的譯注版竟能如此運用於臺灣文學研究，有如譯作之另類遊記，令我既驚且喜。與林交流後進一步得知更早之前還有《小人島》／《小人島誌》連載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91 至 94 期（明治 42 年〔1909 年〕10 月 25 日至 43 年〔1910 年〕1 月 25 日）。我先前譯注《格》書時已根據相關資料發表英文

⁶ 參閱筆者：〈重新整裝，再度出發——《格理弗遊記》普及版的緣起、過程與目標〉，《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4 卷 3 期（2013 年 6 月），頁 11-17。

⁷ 該文刊登於《成大中文學報》32 期（2011 年 3 月），頁 165-98。

⁸ 如第一段第三個腳注有關綏夫的生平與作品簡介，「以上背景參考單德興譯注……頁 34-51」（170）。其他至少還有七個腳注提到此譯注本及筆者相關論述。

論文，探討此書在中文世界的早期接受史。此時更進一步根據林博士提供的資料，撰寫此書在臺灣的早期接受史。⁹

林文刊出之後引發了許俊雅教授的回應文章。許教授先前已有專文綜論日據時期臺灣報刊所刊出的小說之種種改寫現象，並強調在進行相關研究時要特別留意版本的考察與出處的探索。¹⁰ 她將前文的理念集中於探討〈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的譯本來源，經過仔細的考證與文本交叉比對，「極為合理地判斷」（104）《臺灣日日新報》的譯本源自一、兩年前韋叢蕪於北京出版的《格里佛遊記（卷一）》與《格里佛遊記（卷二）》（北京：未名社，1928, 1929），而韋譯本所根據的丹尼斯（G. R. Dennis）編輯的版本不僅列於我參考的十一個英文譯注本之一，而他參考的辜（A. B. Gough）編輯的牛津版也在我參考的三個主要英文譯注本之列（78）。許教授仔細比對丹尼斯所編的英文版本、韋譯本與《臺灣日日新報》譯本後，斷定「臺譯者」的英文程度未必那麼好，並且引用筆者的譯注本以示該譯本對於原文的諷刺掌握不足（80，注 25；103，注 39），所改寫的譯本中的反殖力道也未如林文所說的那麼強烈，因而呼籲研究者必須「重視史料」與「尊重文本」。¹¹ 如果說林文帶給我的驚喜，則許文找出《臺灣日日新報》譯本可能根據的源本，考掘出湮沒已久的韋譯本，讓銷聲匿跡的譯者韋叢蕪（本名韋崇武）再度現身，更令我喜出望外。而這些論述都與我的雙重脈絡化所具現的譯注本息相關。至於以研究《譯介學》聞名的上海外國語大學謝天振教授對《格》書譯注版的六千餘字書評，則是在海峽彼岸出現的另一種衍生。¹²

由於與經典譯注計畫關係密切，除了文學之外，我在書店也會留意並購買其他學門的經典譯注計畫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單文經教授譯注杜威的《經驗與教育》（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¹³ 之所以買這本書一方面因為父母終身為國小教師，我自幼就對教育感興趣；另一方面因為杜威是胡適的老師，

⁹ 前文為“Gulliver Travels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Three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Gulliver's Travels*,” *Swift Studies* 17 (2002): 109-24；後文為“Traveling Text and Dual Contextualization—The Early Reception History of *Gulliver's Travels* in Taiwan,” *Swift Studies* 29 (2014): 42-51.

¹⁰ 許俊雅：〈日治時期台灣報刊小說的改寫現象及其敘述策略〉，《臺灣文學學報》23 期（2013 年 12 月），頁 137-74。

¹¹ 許俊雅：〈日治台灣〈小人國記〉、〈大人國記〉譯本來源辨析〉，《臺灣文學學報》27 期（2015 年 12 月），頁 67-111。

¹² 謝天振：〈台灣來的格理弗——讀單德興教授新譯《格理弗遊記》〉，《文景》15 期（2005 年 10 月），頁 68-73。

¹³ 單文經譯注：《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杜威（John Dewey）原著（臺北：聯經，2015）。

對他影響甚鉅，而胡適曾任中研院院長，其故居和墓園離我的住家和研究室都不遠，經常路過。至於另一個個人因素則是單氏一向人單力薄，難得見到單氏宗親從事翻譯（印象深刻的是單國璽樞機主教多年前曾翻譯《獻身與領導》），遑論經典譯注。

單文經教授根據 1998 年的《經驗與教育》六十週年增訂本重新譯注此書，上篇為譯注者的學術導讀，下篇為譯注本的翻譯，譯文與附文本的分量相當，有關杜威原作的譯注有五十二個，引經據典，中西參照，細析詳解，時而引用自己的著述，在在顯示了譯注者的用心與學養。令我更驚異的是，此譯注本數度引用我有關經典譯注與學術翻譯的看法。如上篇第二章〈杜威其世其人〉開頭便引用我一再強調的「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之說，並仿照我的句法寫道：「此三者相輔相成，對於深深介入當時哲學界、教育界，並且在作品中常常議論時政的杜威來說，更是如此」(23)。第三章〈《經驗與教育》一書的重要性〉開頭再度引述我由於經典譯注計畫，「明顯地覺察到翻譯與譯者的地位逐漸受到肯定」之說，帶入他本人的感想，指出自己致力翻譯四十餘年，「主要是在翻譯過程體驗到譯者與原作者、乃至假想的讀者之間持續進行對話與互動而獲得的成就感。」然而以往「只譯不注」，如今執行譯注計畫，「方才有機會自我超越之」(45)，並表示「依本人理解，譯注計畫實施十餘年來」，《格理弗遊記》「應為最能符合〔國科會〕上述要求者之一」，並帶入了筆者「雙重脈絡化」之說(46)。上篇結論時引用筆者「學術翻譯」之說，並期盼「不論翻譯、注釋與研究皆能臻於真善美的境界」(98)。單文經教授再接再厲，於今年出版另一本經典譯注《重新詮釋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時代意義》¹⁴見到宗親如此投入經典譯注，頗感吾道不孤。

今年 1 月，我應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之邀前往擔任第四屆丘成瑤翻譯講座主講人，除了一場公開演講，並有一場與該系研究生的閉門演講。我趁機以實例說明我從多年翻譯經驗中體會到的有關「學術翻譯」與「雙重脈絡化」的看法。該系為香港首設之翻譯系，結合該校翻譯研究中心，多年來出版品眾多，研究成果豐碩，作育眾多英才，是我多年來佩服的華人世界翻譯研究與教學機構。第二天演講結束後，兩位博士生陪我一路走到火車站，其中一位數度詢問我有關「學術翻譯」三個定義的出處，因為她的學位論文要以此作為立論的基礎，向她她確認這是在十年前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撰文的過程中，根據一己的經驗與想法所歸結出來的看法，也就是：(1) 翻譯的原著本身是具有歷史

¹⁴ 臺北：心理出版社，2017 年 1 月。

意義、學術價值、典範地位的文本；(2) 結合了學術研究的翻譯；(3) 本身可能成為學術研究對象的翻譯。¹⁵ 我的解說令她對自己學位論文的立論基礎更為安心。至於長榮大學翻譯系吳姿燕同學的碩士論文〈強納生·綏夫特《格列佛遊記》二種中譯本比較研究〉則是第一篇以《格》書譯注本為比較研究的學位論文，有如為第三個定義的學術翻譯踏出了第一步。¹⁶

回顧個人的閱讀與學習生涯，翻譯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我的翻譯生涯早於學術生涯，翻譯書籍的數量與種類多於自己的書籍，譯著的讀者一定也遠多於我的學術論述。如果非要我在譯者與學者這兩個身分擇其一，我寧取譯者，因為翻譯中的細讀與傳達包括了學習與分享，而且影響很可能更為深遠。因此，我對於好的翻譯與譯者一直抱持著敬意與謝意，也對於翻譯與譯者未受到應有的尊重與報償一直懷抱不平，並在可能的範圍內致力於做翻譯、研究翻譯、評論翻譯、提倡翻譯。近來受邀演講也盡量以翻譯為主，努力將一愚之得與人分享，希望為打造華文世界更健全的翻譯生態略盡棉薄之力。¹⁷

杜威的《經驗與教育》強調經驗在教育中的重要性，而我有關翻譯與譯者的看法都是來自經驗中，既是「做中學」，也是「學中做」，想必也符合杜威標榜的經驗主義的精神。上述《格理弗遊記》譯注本的不同性質之來生與再生緣，不論是普及版，英文論述，臺灣文學／翻譯史研究，後續經典譯注計畫，或學位論文，雖然大多在我意料之外，卻也見證了經典的威力與譯注的效應，給予譯注者莫大的鼓勵。我也靜待其他的來生與遊記。

在凡事講求速效與報酬率的今天，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更該定下心來，莫為各項指標所迷惑，著眼於輕薄短小的研究，甚至虛偽造假，欺世盜名。應謹記學術、教育與文化無法速成，須步步踏實，時時耕耘，長期累積，正如翻譯是一字一句、絲毫取巧不得的硬功夫，也是自利利人的專業、甚至志業。翻譯惠我良多，我也希望能將此惠澤努力傳遞下去。

¹⁵ 參閱筆者：〈我來·我譯·我追憶——《格理弗遊記》背後的「遊記」〉，《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8卷4期(2007年9月)，頁75-85。

¹⁶ 吳姿燕：〈強納生·綏夫特《格列佛遊記》二種中譯本比較研究〉(臺南：長榮大學翻譯學系碩士論文，2013)。

¹⁷ 如2017年3月2日擔任國立中山大學余光中文講座主講人，講題為「翻譯與雙重脈絡化」；3月16日擔任國立東華大學楊牧文學講座主講人，講題為「從翻譯出發——一位學者／譯者的反思」。